

美国当代妇女运动起因初探

王 政

本世纪60年代是美国社会激烈动荡、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从50年代末美国南方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开始,美国社会经历了由柏克莱大学发起的要求言论自由的学生运动,学生和知识界人士兴起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民间自发组织的反对美国政府侵越战争的运动等等。在社会运动风潮中,美国妇女异军突起,于6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这是美国历史上女权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为区别于19世纪的第一次妇女运动,史学界称之为当代妇女运动。

汹涌澎湃的美国当代妇女运动猛烈冲击了美国的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美国社会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虽然从70年代下半叶起,妇女运动走向低潮,但是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已成为今日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女权主义组织仍活跃在各个领域中,为保护、争取妇女的权益,传播女权主义思想主张而斗争。毫无疑问,女权主义思想和妇女运动还将继续在美国社会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着重探讨美国当代妇女运动的起因。任何一种社会运动的出现都有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现实原因,女权主义作为一个持久、广泛的社会运动也不例外。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女权主义产生的哲学渊源和社会背景,把女权主义运动放在产生它的特定环境中来考察、了解、认识,而不是从既定的框框、概念出发为它下定义。笔者希望本文能增进读者对美国妇女和美国社会文化的了解。

一 哲学渊源

西方女权主义思潮产生于欧洲启蒙运动,洛克和卢梭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倡导的人权思想是女权主义的核心。

洛克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向君主神圣权力提出挑战,主张家庭和国家的分离,争取臣民对家庭和私人领域的绝对权力,强调个人的平等、自治权利和人际之间的竞争、交换关系,宣称人具有生命、自由、财产等“天赋权利”,为资产阶级参予政治制造合理依据。自由主义理论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理论基石,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天赋人权”概念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欧洲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但是在自由主义派为个人争取权力和权利时,这个“个人”的含义是“有财产权的男性户主”,而不是指社会中的所有成员。洛克的理论强调家庭和国家的分离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但同时却让家庭的内部关系保留父权制的特征:家族的统治,等级制,强调成员的责任

和义务,而不是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在传统父权制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因此不属于享受个人平等权利的对象。^①

宣称“人生来平等”的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们也仅仅是为男性白人的独立、自由、平等权利而斗争,美国革命后通过的宪法只字未提美国妇女和黑人奴隶的权利。^②这样,在美国革命后,一方面自由、民主、平等一类自由主义基本概念广为传播,男性白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享有更多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女性的平等权利却始终遭到排斥。

然而,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不可避免地波及到欧美中上层妇女。一些妇女开始把自由主义理论与妇女地位联系起来,希望妇女也能和男子一样享有“天赋人权”。1792年英国妇女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第一本女权主义理论著作《维护妇女权利》,指出妇女处于受奴役的地位是由于腐朽的社会化过程诱导妇女把侍候男子作为唯一的生活目标,阻碍了妇女智力的发展。她呼吁社会给予妇女平等的受教育和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权利,使妇女获得理性思考能力,成为与男子一样独立的人。^③

1848年,美国妇女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起草了《观点宣言》。此宣言套用美国《独立宣言》的格式和语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他们具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这些权利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人类历史是一部充满了男人对女人的非正义和侵占的历史,是以建立对女性的绝对专制为目标的。”^④美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明确地运用《独立宣言》作为她们的理论武器,表明了美国女权主义对自由主义哲学的继承关系。西方女权主义从诞生起便是妇女试图扩大“天赋人权”范畴的一种努力,也是西方社会个体化发展同保持妇女在传统父权制中的从属、依赖地位的矛盾深化的反映。

美国当代女权主义在继承自由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吸收了其他社会思潮,其中主要两种思潮是:

1. 19世纪的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到缺乏经济手段的政治自由主义是空洞的,争取经济权利是保障政治权利的前提。19世纪西方社会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开始了财产权利民主化的斗争,如美国法律取消了长子继承权。马克思主义为这场斗争确立了最高目标: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仅有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而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变革,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无法消除的,真正

① 约翰·洛克,《两种政府协议》(John Lock,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308—356页。

② 美国制宪者们(全部是男性)在起草和修订美国宪法过程中没有对妇女权利问题做任何说明。宪法规定选举权属于州权范畴,19世纪中仅个别州出于本州的经济、政治利益需要,授予妇女选举权。爱伦·卡洛尔·杜博伊指出,在西方经典民主政治理论中,公民选举权和他的独立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依赖地位决定了她们不能享有独立的个人应有的权利。美国妇女经过长达70多年的斗争,终于在1919年使国会通过了第19条宪法修正案,给予妇女选举权。

③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维护妇女权利》(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巴尔的摩1975年版。

④ 朱迪斯·霍尔和爱伦·利文,《女权主义的再生》(Judith Hole & Ellen Levine, Rebirth of Feminism),柯德兰格尔图书出版公司1971年版,附录第431—433页。

的社会公正意味着经济上的平等。19世纪末女权主义理论家夏洛蒂·珀金斯·吉尔曼运用社会主义理论分析美国妇女的从属地位与经济上依赖男性的内在联系,并在《妇女与经济》和《家庭》两部著作中描绘了使妇女获得经济独立的蓝图。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妇女在人类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更多的关注,争取妇女的经济权利(包括财产权、就业机会、同工同酬、不同工作的合理比较价值等)是当代妇女运动的重要内容。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对性欲和性行为在社会政治中的意义的研究。

从哈夫洛克·葛利斯和弗洛伊德开始,西方众多的著名学者对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已形成社会理论的一个分支。他们着重审视性欲与社会的关系,性压抑与文明的关系,个人心理形成与社会秩序产生的关系等。在这一思潮影响下,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家以很大的精力分析女性性欲,性与妇女从属地位的关系,性别身份的形成,潜意识、非理性与直觉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等。

当代女权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性三方面的平等权利要求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对这三方面自由的探求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女权主义在吸收、继承西方主要思想潮流时,还对它们加以批判、改造,摒弃这些理论中父权制的残余和以男性为中心出发而产生的偏见和谬误,宏扬被父权制历史所贬抑的女性价值观。女权主义以它独特的分析角度和批判锋芒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中推陈出新的动力,也为妇女运动的持久深入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 社会背景

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持续70多年,到1919年妇女获得选举权后转入低潮。50年代末、60年代初绝大部分美国妇女已对第一次妇运和女权主义思想毫无所知。然而,到60年代末,妇女运动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和迅猛的势头在美国爆发。是什么潜伏的社会矛盾导致了这场社会运动的呢?欲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美国50—60年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剖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社会带来诸多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妇女大批进入劳动力市场。从1941年到1945年全美国有650万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就业增长率为57%。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查夫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妇女就业史上的分水岭,它给妇女经济地位带来的变化远远超过女权主义者半个世纪的宣传鼓动所能达到的。”^⑥除了史无前例的就业规模以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妇女就业还有这几个特点:1. 妇女进入传统的男性工作领域,如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美国国防工业在战争期间招雇了200万女工,女工增长率为460%。2. 妇女成为机关办公室的白领工作人员。从1940年到1945年有将近100万妇女在联邦政府各部门工作,另有100多万妇女成为私人企业中的白领雇员。3. 已婚妇女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650万美国妇女中,75%是已婚妇女,妻子母亲占妇女就业人数的比例从1940年的15.2%上升为1945年的一半以上。^⑦

^⑥ 威廉·H·查夫:《美国妇女: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1920—1970》(William H. Chafe, *The American Women, Her Changing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s 1920—1970*), 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136页。

^⑦ 查夫:《美国妇女: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 1920—1970》, 第141—146页。

战争结束后,美国社会曾出现过对失业和经济萧条再现的恐慌,政府舆论机器开始鼓动妇女返回家庭,把就业机会让给大批复员军人。然而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滞缓现象。同共产主义世界对峙的冷战保证了美国国防工业的持续迅猛发展,在30年代大萧条和40年代战争期间压抑了的民间消费需求刺激了美国消费品工业的兴旺发展。经济大发展保持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而第三产业的兴起和白领工作的增加则为妇女劳动力打开新的市场。美国妇女就业势头在战后有增无减,1947年妇女就业比例是29%,1960年增长为37.7%。^①

战后美国妇女就业人数持续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舆论界和政府的宣传把妇女就业赞美为爱国行动,打消了中产阶级妇女就业的思想障碍。尽管战后社会舆论不再鼓励妇女就业,但中产阶级妇女参加工作已不再被看成“不体面”。

2. 战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产生了大量白领工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提供了适合她们阶级地位的工作机会。到1950年全美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妇女是白领文职人员,其中白人妇女占66%。

3. 战后美国的通货膨胀使丈夫一份工资难以实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物质期望。购置房产、买汽车和其他现代化家庭用品是战后大部分美国家庭的目标,妻子工作可以明显地提高家庭的购买力。1954年美国人力委员会一项调查表明40%年收入在6000到10000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是双职工。查夫认为,战后妇女就业的增长是美国中产阶级比例扩大的重要步骤。^②

4. 美国妇女生育率伴随工业化的发展而逐年下降,白人妇女生育率从1840年的6.14降到1940年的2.18。已婚妇女到35岁左右已基本完成养儿育女的责任,有剩余的时间精力外出工作。从1940年到1950年有250万35岁以上的妇女参加了工作,1962年已婚妇女占妇女劳动力的60%。和19世纪中叶相比,20世纪中叶美国妇女劳动大军的成分发生明显变化。如果用两幅肖像来描绘两个时代美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前一幅应该是一个从事蓝领工作的年轻、贫穷的单身女子,很可能是移民;后一幅则是一个从事白领工作的中产阶级已婚妇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妇女大批地走出家庭,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19世纪男女“分离领域”观念产生的经济基础。^③然而把妇女囿于私人领域的传统观念仍顽固地主宰着美国的意识形态,成为妇女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在战后恐共反共的保守政治气氛中,美国社会舆论把传统模式的家庭视为抵御共产主义颠覆的堡垒。维护传统家庭,坚持男女传统性别角色与冷战联系起来,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部分。在麦卡锡主义时期女权主义被指责成披上伪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其目的

① 罗歇尔·盖特林:《1945年以来的美国妇女》(Rochelle Gatlin, *American Women Since 1945*), 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35页。

② 查夫:《美国妇女,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 1920—1970》, 第183页。

③ 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社会大变革。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男子走出家庭投入社会生产活动;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妇女则以操持家务为职责。有能力赡养家庭妇女妻子,成为男子步入中产阶级阶层的标志。“分离领域”观念相伴出现,即,男子主宰公共领域——政治、经济、科学、军事等;妇女则只能在私人领域——家庭中扮演唯一适合她们的角色:贤妻良母。

是颠覆美国的家庭。连妇女活动家为建立托儿所在各州筹集经费的活动也被戴上红色帽子，因为据说托儿所是同共产党有关的左派分子的创造。心理学家们也纷纷著书论证女权主义者是心理变态的女人。一时间女权主义不仅不再时兴，而且成了贬义词。美国社会中这支争取妇女进步的主要力量遭受打击后，保守势力更得以压倒优势制造舆论，鼓吹传统女性角色的重要意义。^⑩

40年代下半叶与50年代，美国的报刊、杂志、广告、电视全力以赴地塑造起一个个快乐富足的家庭妇女形象，并作为美国妇女的理想典型来宣传。早已被19世纪女权主义者所批判的传统女性观又堂而皇之地占领舆论阵地，并贴上了“现代化”的标签。如《大西洋报》一篇文章宣称：“现代妇女所必须恢复的是这一常识：做一个女人是她的中心任务和最大荣誉。……妇女必须勇敢地宣布没有一项工作比做家庭妇女和母亲更激动人心，更有必要，更有价值。”《周末评论》一篇文章同样认为：“做个好妻子，好母亲，简而言之，做个好家庭主妇是世界上一切工作中最重要的。”^⑪在1959年著名的“厨房辩论”中，尼克松向赫鲁晓夫炫耀美国现代化家庭设备，并声称：“让我们的家庭妇女生活得方便些，这种对待妇女的态度是普遍的。”^⑫尼克松所宣扬的正是战后美国的理想家庭观和理想女性角色观：丈夫挣工资赡养一个漂亮的家庭妇女，而操持家务则是妇女至高无上的职责。

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把50年代泛滥的传统女性观称为“女性的奥秘”，并对在“女性的奥秘”笼罩下的一代妇女的生活作了如下描述：

“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从对传统习惯和弗洛伊德精深理论的宣传中听到：她们能指望的最好命运是自得于自己的女性味。专家们教妇女怎样去勾住一个男人并留住他，怎样给孩子喂奶把尿，怎样处理子女间的纠纷和青春期的反叛心理，怎样买洗碗机，怎样烤面包，做美味蜗牛，怎样自己动手建游泳池，怎样在穿着、容貌、举止上显得女性化，使婚姻更有趣味，怎样避免她们的丈夫早死和儿子变成少年犯。妇女们学会了可怜那些神经质的，没女人味的郁郁寡欢的女人，这些女人想当诗人、物理学家、主席。妇女们知道真正具有女性味的女人是不想要什么事业、高等教育、政治权利等那些老式的女权主义者所竭力争取的独立和机会。一些40、50岁的妇女仍然痛苦地记得自己丢弃了那些理想，而大部分年轻妇女则已不再去想这些了。上千个专家赞扬年轻妇女的女性味、自我调节和成熟感。她们所需要做的一切便是从年轻姑娘时起便致力于找丈夫和养孩子。”^⑬

在“女性的奥秘”影响下，大部分年轻妇女认为结婚生孩子是女人唯一的生活目标和幸福源泉。50年代末，美国妇女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20岁，1400万姑娘不到17岁便订了婚；大学女生比例从1920年的47%降到1958年的35%，60%的女大学生因结婚而中途退学；“事业妇女”比例从1930年的15%降到1960年的11%；妇女总生育率从1940年的2.23上升到1960年的3.61，改变了一个世纪来的下降趋势，回到了19世纪末的水平；独身妇女比例从19世纪末的

^⑩ 盖特林，《1945年以来的美国妇女》，第8—10页。参阅艾琳·泰勒·梅，《走回家庭》(Elaine Tyler May, *Homeward Bound*)，纽约1988年版。

^⑪ 查夫：《美国妇女：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角色，1920—1970》，第206—207页。

^⑫ 梅：《走回家庭》，第18页。

^⑬ 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Betty Frin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纽约1983年版，第16页。

20%降到20世纪中的5%。^⑭

然而，正当年轻一代妇女放弃对事业的追求，满足于做贤妻良母时，大批完成了生育任务的妇女则步入就业领域。如前所述，二次大战后美国社会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妇女被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所吸收，家庭妇女并非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女性的奥秘”意识形态实质上与变化了的美国经济现实相矛盾，这一矛盾严重损害了美国就业妇女的利益：一、在“女性奥秘”的强大舆论压力下，就业妇女因自己不符合家庭妇女贤妻良母的理想形象而有负疚感和无所适从。二、由于操持家务仍被视为妇女的职责，就业妇女不得不扮演双重角色，既要外出工作，又要承担全部家务。许多为经济所迫、不得不在子女尚幼时便外出工作的妇女还面临着无处托儿的困境。社会则完全漠视就业妇女的重负和困难。三、在就业领域中，妇女面对着传统的性别隔离（妇女只能干所谓的“女性职业”，如打字员、秘书、接线员、护士等。“女性职业”待遇报酬普遍低于“男性职业”。）和同工不同酬，但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来解决这类不公正现象。不仅如此，在“女性奥秘”观念统治下，社会上盛行一种看法，认为妇女就业是临时的，只不过为自己挣些零花钱，她们的丈夫才是家庭经济柱子，因此男子收入应该高于妇女。“女性的奥秘”和“男女分离领域”一类观念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妇女廉价劳动力的理论依据。简而言之，妇女就业虽然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她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提高。职业按性别分隔的状况实际上是“男女分离领域”的传统观念在公共领域中的延伸，无助于改变社会上的大男子主义和歧视妇女的态度。美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自动产生出相应的观念形态来改善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受到“女性的奥秘”危害的不仅是就业妇女，许多家庭妇女，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也承受着这保守意识形态的压迫。同舆论宣传中幸福知足的家庭妇女形象相反，单调的生活内容和狭小的生活范围使许多家庭妇女感到格外孤独、寂寞、空虚，现代化家庭设备和高消费物质生活并没能为她们增添幸福感。这些妇女无法认识问题的实质，只是体验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烦恼。“有一种奇怪的骚动，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一种渴望在折磨着20世纪中叶的美国妇女。每个郊区妻子独自同它搏斗着。当她在铺床时，买日用品时，配沙发套时，同孩子一块吃花生酱三明治时，开车送他们参加童子军活动时，夜间躺在丈夫身旁时，她甚至害怕默默地询问自己：‘这就是一切？’”^⑮精神上的痛苦消损了家庭妇女的健康，50年代里美国医务界注意到家庭妇女就诊人数增加，患有头痛、失眠、精神压抑和神经衰弱等症状的家庭妇女比单身妇女多。医务界把年轻家庭妇女中常出现的难以诊断的症状，如出气泡、周身不适、神经质、疲惫感等称为家庭妇女综合症。^⑯

1960年美国新闻界开始报道家庭妇女中的问题，暴露了一些与“幸福的家庭妇女”形象不符的事实，但是对“陷入困境的家庭妇女”的不幸根源却没有深入的探究。作为市郊中产阶级家庭妇女一分子的贝蒂·弗里丹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她向自己的校友们发出调查表，

^⑭ 盖特林：《1945年以来的美国妇女》，第18页。

^⑮ 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第15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中产阶级家庭移居郊区，拥有独栋房子，郊区家庭妇女的生活更为孤独。

^⑯ 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第293页。

了解1942年毕业的女大学生们的生活状况，并向她周围一百多个家庭妇女作调查，形成了她对家庭妇女无名烦恼根源的认识。她把约束压抑妇女的统治意识形态称为“女性的奥秘”。1960年《好主妇》杂志登载了弗里且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在家庭妇女中引起巨大反响，证实了美国妇女生活中确实存在问题，“女性的奥秘”确是导致许多妇女精神痛苦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弗里且于1963年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用丰富的调查材料揭露“女性的奥秘”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压迫，谴责美国家庭是妇女们“舒适的集中营”，呼吁妇女们挣脱“女性奥秘”的精神锁链，走出家庭，在社会中，在事业中寻找真正的自我价值。《女性的奥秘》立刻成为畅销书，销售量近100万册。大量女读者纷纷写信，感激弗里且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许多女读者开始重新思考她们的人生。尽管弗里且并未能提出社会改革方案来根本改变男女不平等现象，她也并没在书中鼓动一个社会运动，但是她准确地抓住了这一时代压迫妇女的意识形态为攻击目标，用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来唤醒一代精神麻木的美国妇女，从而为女权主义在60年代的崛起作了有力的舆论准备。

60年代上半叶还发生了两个有意义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为当代妇女运动作了铺垫。一是肯尼迪当选总统后成立了一个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专门调查美国妇女的现状，提出保证妇女基本权利的措施。这个委员会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肯尼迪向帮他竞选的女活动家们作的一个政治姿态，然而它的诞生对女权主义的复兴产生了始料不及的作用。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涉及面相当广的美国妇女现状调查报告，如实反映了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各领域妇女的不平等待遇，并对改善妇女现状作了大量建议，日后妇女运动的许多要求是根据这份报告提出来的。尽管联邦政府并未立即采取相应措施解决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但委员会存在的本身把妇女地位问题在美国社会中提了出来，成为社会中日益热门的话题。各州纷纷仿效联邦政府，相继成立州妇女地位委员会。州委员会不仅比总统委员会更深入地了解妇女状况，更重要的是为妇女活动家们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讨论妇女问题的场所。在各州委员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妇女积极分子逐渐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联系网络，为有组织的妇女运动兴起奠定了基础。在1966年的全国州委员会代表大会上，一些妇女不满于官方组织在反对性别歧视上的保守态度，宣布脱离州委员会，自行成立了富有斗争精神的妇女全国组织，由因《女性的奥秘》一书闻名的贝蒂·弗里且任主席。这一事件预告了一个全国妇女运动的来临，美国政府在无意中为女权主义的复活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①

另一事件是肯尼迪政府于1963年通过了《同酬法》，规定雇主必须对在同等工作条件下干同样工作的男女支付同样的报酬。这项法律没有规定雇主给妇女平等的雇佣机会，也缺乏有力的实施措施。不少雇主把同样性质的工作标上不同的名称来躲避《同酬法》，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同酬法》生效后仍普遍存在。尽管有不少缺陷，《同酬法》毕竟是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第一条反对性别歧视的法律，它的通过意味着美国政界开始对妇女步入公共经济领域这一事实作出反应。

1963年《女性的奥秘》的出版和《同酬法》的通过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历史事件，它们集中体现了第二次大战后美国妇女生活中的深刻矛盾：传统观念和现代经济之间的冲突，

^① 霍尔和利文：《女权主义的再生》，第24、25、82、83页。

家庭主妇和挣工资者两种角色要求之间的冲突,就业机会扩大和缺乏平等权利的冲突。这种普遍存在的矛盾以及蕴伏在广大美国妇女心中的压抑、不满为一场大规模妇女运动的爆发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三 直接原因

正如美国19世纪的废除奴隶制运动孕育了第一次妇女运动,20世纪美国黑人的争取公民权利运动则成为当代妇女运动的催化剂。一个受到社会歧视的种族奋起反抗,发出了“平等、自由、民主、正义”的呼喊,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受到性别歧视的妇女,使她们也萌生了争取平等自由的热望。以弗里且丹为第一任主席的妇女全国组织是60年代第一个向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中性别歧视挑战的妇女组织,在早期民权运动原则影响下,它的宗旨是在现行的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中争取妇女的一份权利。妇女全国组织是60年代妇女权利运动的中坚力量,然而当时美国公众对这一较为温和的妇女组织并不很关注。此后在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崛起的,以青年女学生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则震撼了美国社会,标志了一个独立的、大规模的妇女运动的兴起。

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传播,民权运动在60年代上半叶已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社会运动。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勇敢的斗争极大地吸引了南北方白人男女大学生,^⑩许多大学生纷纷加入黑人斗争行列,为消灭种族歧视并肩战斗。由于阶级、种族的差异,参加民权运动的白人学生往往要受到家庭的阻挠和社会舆论压力,而女学生则更多一层束缚——“女性的奥秘”。按社会的要求,女大学生的归宿是家庭,社会运动非一个具有“女性味”的女子应该介入的。是民权运动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和黑人男女的英勇斗争鼓舞了白人男女学生冲破重重阻力。白人女学生尤其为富有斗争精神的黑人妇女所吸引,她们完全不同于中产阶级白人主流社会所塑造的被动、依附的“理想女性”形象。在民权运动中,许多黑人妇女以自己独立的人格、坚定勇敢的斗争精神和杰出的领导才能赢得人们的敬重,她们也为白人女学生树立了全新的榜样。

民权运动不仅使女学生们挣脱了“女性奥秘”意识形态的束缚,也为她们提供了锻炼自己的场所。女学生们和男生一样参加静坐、游行、发表演说、写文章、动员黑人选民登记投票、发展民权运动组织等等。民权运动中的活动经验使许多女学生成了日后妇女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然而,直接诱发妇女解放运动的却不是上述正面因素,而是民权运动中的消极因素——性别歧视。尽管“自由平等”是民权运动的主导意识形态,但它并未能消除男子头脑中把妇女置于从属地位或当作性工具的传统观念。女学生们发现在民权组织内部她们仍然得扮演家庭妇女的传统角色,尽管有少数女性处于领导地位,但组织内的打字、文书工作和做饭、煮咖啡、打扫房间等家务则全部由女青年干。美国社会男女分离领域的传统被带进了这个争取消除种族隔离的运动,为黑人的平等权利斗争的女青年却不能享有和男子平等的待遇,这使她们产生不满和愤慨。

^⑩ 60年代上半叶美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育高潮中出生的孩子大批涌入高等院校,使在校人数从60年代初的380万激增到60年代末的780万。1970年全国三分之一的适龄女青年进了大学,60年代美国大学生众多的人数决定了他们是一支不可低估的社会力量。

白人女青年不仅在分工上体验到性别歧视,在同黑人男青年的性关系上也常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60年代美国“性解放”的浪潮冲击了传统的男女双重道德观和女性贞操观,但美国妇女并没有因为性自由而获得真正的平等,她们在享受性自由的同时往往发现自己被男子当作性工具对待。在民权运动中,黑人白人青年之间混杂的性关系普遍发生,尽管不少种族间的性关系是出于相互的热情和关切,但更多的性行为并非出于爱情。黑人男子与白人妇女的性关系在南方一直是禁忌的,白人女青年南下参加民权运动后,同她们发生性关系成了考验一个黑人男青年有没有男子气的行为。据一个民权运动成员说:“除了少数例外,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每一个黑人工作者都把同一个白人妇女睡觉当作一项战功——越多越好。”^①白人女青年面对这种情形,进退维谷:如果她们拒绝黑人男青年的性要求,她们会被指责为种族歧视分子;如果她们向这种压力屈服,她们又会被看成是放荡的女人,更容易变成男同事的性工具。正如美国学者伊文斯所说:“性自由和性剥削之间的界限是很窄的。”^②白人女青年在性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经历着性剥削的痛苦,加上种族关系,使她们难以清晰地分析问题的实质。然而,日益加剧的不满使她们终于开始议论妇女在民权运动中的地位问题。

1964年白人女青年玛丽·金和凯西·海顿在与其他妇女讨论后,起草了一份表达妇女观点的报告,例举了民权组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指出:“男子优越的观念同白种优越的观念一样流传广泛、根深蒂固,也像白种优越观念挫伤黑人一样伤害着妇女。”^③她们明确地把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作比较,以揭露这个为取消种族歧视而斗争的组织同时实行性别歧视的荒谬和矛盾。但这份报告非但没有引起委员会的重视,反而成了组织中男子们的笑料。金和海顿在一年以后又写了份“备忘录”,向活跃在各社会运动中的妇女提出妇女地位问题。这篇题为“性别和等级”的文章把妇女的从属地位提到社会等级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并涉及到妇女在工作、生活以及同男性个人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文中指出:“整个社会对黑人和妇女的待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运动中工作的妇女,似乎被卷入了一个由习俗形成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微妙地迫使她们围着一个排斥她们的等级权力结构运行。……这个等级制度最糟之处是利用和剥削妇女。”^④“备忘录”在日益转向“黑色权力”的民权组织中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响,却在北方学生新左派组织里引起白人女青年的极大共鸣。

新左派核心组织学生民主社会(下称学民会)是60年代影响最大的学生组织,早期成员大部分是北方名牌大学的男女尖子学生。60年代初他们积极组织各项反对种族隔离的活动,当民权运动逐步转向排斥白人积极分子、主张黑人独立的“黑色权力”运动以后,学民会活动中心转向反对越南战争和反对征兵。学民会男性骨干成员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对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和传统文化持尖锐批判态度,主张一个人人能参与分享的民主制度。然而,他们象其他美国男子一样也漠视社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也以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大男子主义

^{①②} 萨拉·伊文斯,《个人政治》(Sara Evans, *Personal Politics*), 纽约1980年版,第80、81页。

^③ 摘自“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观点报告(运动中的妇女)”1964年11月(SNCC Position Paper, *Women in the Movement*), 见盖特林,《1945年以来的美国妇女》,附录第233-235页。

^④ “性别与等级”,(Sex and Caste), 1965年11月18日, 见伊文斯,《个人政治》,附录第235页; 238页。

对待妇女。学民会内部的性别歧视现象不亚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女青年被分配干辅助性的工作，她们的意见受到轻视，有才干的女青年被排斥在领导层外，只有男领导的女友才有机会了解内圈决策层的情况，而这女友的身份又往往是短暂的，女青年们对自己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早已不满。当“备忘录”传到她们那儿时，她们便决定在学民会全国大会期间组织一个妇女问题讨论会，思考妇女在运动中和社会上的作用、地位问题。会议期间，许多男会员根本否认组织内存在妇女问题，但女会员们则提出妇女和黑人一样是被压迫阶级，指出男子对妇女的态度近似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态度（性别歧视一词当时尚未出现）。这次妇女问题讨论会成为“新女权主义造反的萌芽”。^②

学民会内部的性别矛盾随着学生运动转向反战和反征兵运动而日益激化。虽然妇女也积极参加反战和反征兵活动，但因征兵对象是男子，妇女的主要作用便局限为对拒绝应征的男青年给予精神安慰和支持。在一个性自由时代，这种安慰和支持往往以性的形式来表现。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形象地说明了妇女在反征兵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姑娘对说‘不’的小伙子说‘行’”。满足男子的性要求变成一项革命任务，妇女在运动中仅仅成了男子的性伙伴。一位女积极分子日后评论道：“妇女在这运动中扮演了最难令人置信的从属角色，……因为妇女不能烧征兵卡，不会进监狱，所以她们可能做的一切是通过男人和运动联系，这在我看来是最降低人格的事。”^③学民会领袖汤姆·海顿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不无歉疚地谈到：“妇女可以自由选择众多的男友，却不能自由地逃避被动工具的形象。对像我这样的男学生来说，这种新气候仅仅意味着有了更多任我享用的女人，但无人想到那些妇女的灵魂和需要。……（学生）运动是大男子主义者的天堂，男子既掌握大权，又有宽裕的不平等的性联络机会。”^④

学民会内的女青年们因自己从属的、性伙伴的地位对学生组织日益产生疏离感。在新左派第三世界理论的影响下，她们开始把妇女比作第三世界，称妇女与男子的关系是殖民关系。1967年6月学民会一些妇女写了一篇声明提交代表大会，声称：“由于妇女同男子的殖民关系，妇女必须为自己的独立而斗争”。女青年的观点受到与会男子的嘲弄和反对。当女青年们在1967年8月学民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提出妇女问题，仍然被男子以轻侮的态度否定时，^⑤被激怒了的女青年终于决定脱离学民会，酝酿发动一场独立的妇女运动。她们随即起草了一篇题为“致左派妇女”的文章，在新左派刊物上发表。文中她们追溯了自己对妇女受压迫的认识过程，把大男子主义提到社会问题的高度，而不仅是运动中的妇女追求个人解放的问题；她们把黑人独立运动作为榜样，提醒妇女避免民权运动早期的错误，不要让“别人（对黑人来说是白人，对我们妇女来说是男人）来规定我们的议题、方法和目标。只有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对我们的斗争下定义。……我们必须以一种政治方式来对待这个问

^② 见伊文斯，《个人政治》，第7章。

^③ 见伊文斯，《个人政治》，第179-182页。

^④ 汤姆·海顿：《重圆——回忆录》(Tom Hayden, Reunion—A Memoir)，纽约1988年版，第107-108页。

^⑤ 会议期间，几位女青年上台要求发言，大会主席拍拍她们的头说：“站一边去吧，小姑娘，我们这儿有比妇女解放更重要的事要谈。”见伊文斯，《个人政治》，第197-199页。

题。”她们宣告：“作为妇女，组织一个妇女解放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②这篇文章是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诞生的宣言书，在各个组织中受性别歧视压抑已久的妇女迅速在“妇女解放”的旗帜下聚集起来，各地纷纷成立独立的“妇女解放”小组。不久，通过新闻媒介，“妇女解放”的口号传播到社会上，吸引了大批家庭妇女、就业妇女等投入反对性别歧视社会制度的斗争。女青年激进的、排斥男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由年长的专业妇女倡导的妇女权利运动汇集起来，动员起从基层到政府上层各方面的妇女，形成了多姿多彩、影响广泛的当代妇女运动，改变着千百万美国妇女的命运。

结 论

6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的复活从本质上说是美国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理想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在个体化、多元化的美国现代社会中，各社会阶层只有形成自己的组织力量才有可能争取到自己的一份权利，才可能迫使政府或社会作出符合自己阶层利益的反应。从19世纪的小农场主运动、工人运动到20世纪的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运动都体现了美国社会这一基本特点。人权并不是天赋的，而是各阶层人民以自己不懈的斗争才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范围不断扩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变化了的经济现实使广大妇女进入公共经济领域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在这一新形势下，坚持把妇女囿于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的观念和企图只能是加剧美国社会中的性别矛盾。60年代的公民权利运动、学生运动为一代女大学生们提供了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武器，开辟了锻炼女青年才干的新天地，使她们获得了她们母亲一代所不具备的扮演新的社会角色的机会。同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和性别歧视却试图把她们局限在传统女性角色中。实际上，运动中女青年的情形是美国社会上大多数妇女的困境的一个缩影。然而，经受了社会运动思潮熏陶的女青年有可能以民权运动的理想和新左派理论对照分析妇女的处境，女青年的集中与交流机会也使她们不再孤立地对待个人的挫折和不满，从而产生一种女性的群体意识和对妇女作为一个整体的潜在力量的信心，多年社会运动的锻炼则成为她们开创一个自己的运动的必要实践准备。因此，当学生运动内部性别矛盾进一步激化时，她们能够揭竿而起，打出了妇女独立解放的大旗。以中产阶级白人为主体的年青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口号行动有时趋于偏激，她们对美国妇女状况的分析也往往反映出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比如，把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境遇同黑人相提并论，抹杀了前者因种族、阶级而仍享有特权的事实，忽视了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妇女在一个种族歧视社会中所承受的双重压迫。尽管青年女权主义者有不可避免的稚嫩和局限，广大美国妇女对她们要求平等的呐喊的强烈反应证明女权主义开掘了埋藏在美国社会底层中极大的郁闷和愤慨，她们是20世纪下半叶促进美国妇女进步和社会正义的先锋队。

〔本文作者王政，1952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现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校区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② 伊文斯，《个人政治》，第200页。参见盖特林，《1945年以前的美国妇女》，第94页。